

6月初，北京友人來信說：「『三邊互動』小而有情致，是你們的一大發明：希望它能為討論起一點熱眼旁觀的作用。」「熱」眼旁觀，一字之改，盡得中文之精妙。盼望有更多讀者，對本刊熱眼旁觀之餘，說幾句話、寫幾行文字，寄給我們。

我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已經有三十九年歷史的英文雙周刊《中國新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Hong Kong)最近出了題為〈破碎了的分形：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的專刊(1992.6.15)介紹本刊，其中有這樣的話：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將會是甚麼樣子？這問題已反覆討論得那麼爛熟，它好像不可能再產生新意了。然而，一些來自大陸的學者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創辦的新刊物《二十一世紀》(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卻在這方面開拓了新領域。這本編輯嚴謹、插圖豐富的雙月刊是1990年10月創刊的，它的宗旨正就是「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

從《二十一世紀》作者群的分析可以看出它的獨特性，因為它以特有方式把哈佛學者杜維明所謂構成「文化中國」的「三個象徵宇宙」(按：指大陸、港、台、新加坡等華語區學者，旅居歐、美的華裔學者和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融合在一起了。《二十一世紀》在香港出版不但表明香港知識分子日益重要，而且彰顯了香港作為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大陸乃至整個「文化中國」的言論廣場這一地位。

——編者摘譯

92.7

### 我讚賞編者「逆歷史潮流」

第10期值得注意的是華倫斯坦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沒落〉。當福山的文章傳入大陸之後，我們都在嚴肅地反問：歷史真會終結嗎？蘇聯東歐的鉅變對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發展當然是幸事，但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未必是幸事。尤其是西方的左派普遍衰落，右派甚囂塵上，這種力量和思想的不平衡將使人們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負面效應喪失超越性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二十一世紀》能夠「逆歷史潮流」，發表華氏的慷慨之論，確是識見。我很讚賞編者這種卓立不群的精神。

讀者 上海

92.5.21

### 哲學與史學詮釋，不存在孰優孰劣

杜維明由個人—倫理層次理解克己而詮釋之為修身，

這是按孔子德治—內聖的哲學思路。何炳棣由社會—禮樂層次理解克己而詮釋之為對統治者期望恢復治周禮，這是按孔子禮治—外王的哲學思路。內聖是人格塑造，外王是社會改造。倫理層次的禮儀是哲學的進路；禮樂層次的禮儀是史學的進路。史學與哲學對儒學的詮釋與理解，不存在誰優誰劣的論斷，兩造互補學術當更為功德無量。

李詩錦 新加坡

92.5.28

### 是對保守主義思潮清醒估計的時候了

貴刊第10期黃國彬先生〈白話文的得與失〉一文，標題就好，常到我這裏翻書的朋友，抓過去就讀。可惜，讀後無人置一詞。我覺得奇怪，仔細讀了，覺得這也算一種典型——保守萬能論。現在中國思想界，從大陸到海外港台，從左到右，保守主義盛行。健康的保守主義很不錯，因為健康；深刻的保守主義也不錯，因為深刻；新儒家保守主義也不錯，因為長志氣。一味保守，唯保主義，把中國現代一切問題推到激進者身上去，這與唯激主義一樣淺薄。我看是

對保守主義潮流作個清醒估計的時候了。

黃文說是五四「動輒鄙棄文言」，結果五四作家文字，「平淡有餘，精鍊不足」，甚至「中文就會變成西文的租界」。

別的不說，現代漢語在五四時期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就就是其文體彈性：從廢名的沖淡，到老舍的土白，到林語堂的典雅：從朱光潛譯哲學的深沉，到傅東華譯通俗小說的暢曉——如果我們至今在用嚴復、章炳麟的文字，中國現代文化能想像嗎？

我很同意黃先生所說的，「高手之筆，可以反魄回魂，叫死文字復活」。但這不也是由於現代漢語的風格寬度？引一句黃先生的文字：「中國言語(文字)在手、就可以出入陰陽、窮究人情物理、曲達哲思、幻想而挫六合於筆端的尹吉甫、莊子、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蘇東坡、曹雪芹等語言大師，聽了魯迅和瞿秋白菲薄中文的話，真不知該笑還是該哭。」(頁49，註③)

我覺得該笑，因為漢語經過十多個世紀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造，其容忍度大到能讓黃先生這樣的句子也算作漢語。上述哪一位大師能寫出三十五個字收於「的」的長定語？

趙毅衡 倫敦  
92.7

第9期刊出〈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牢籠〉後，有不少讀者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質疑和見解，以下三則，問題都很尖銳。

——編者  
92.7

## 是文化選擇還是政治選擇？

該文一反過去着重從外來影響方面進行研究的方法，着重剖析了中國新文化啟蒙運動自身發展的邏輯，不論是研究方法和具體結論，都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異化，固然有文化運動內在的動因和自身的缺陷。但是，中國馬列主義者接受新意識形態，更多的是政治的選擇，而不是文化的選擇；更多的是從反帝、反封建、挽救民族危亡和勞苦大眾苦難的現實需要出發，而不是從相信馬列主義能夠解決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主題出發，甚至未必認識到這個主題。

讀者 陝西  
92.5

## 關鍵在於理性精神的「資源」貧乏

〈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牢籠〉試圖解決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起源這一問題的關鍵：即意識形態是怎樣在新文化運動中完成了一次更替？這是富有震撼力的觀點。

我的一點疑問來自兩個方面：(1)從功能上講，新文化運動確實完成了一次意識形態的更替；(2)但是，當我反覆閱讀論文第五節——「拋棄舊意識形態的方式：整體反傳統主義」時，依然感到，文章分析的三個新文化運動的前提，與「整體反傳統主義」在邏輯上的聯繫依然不充分。也就是說，三個前提不足以解釋「只換內容不變結構」的更替方式。

我傾向於把「只換內容，不變結構」的原因歸結於當時歷史條件下的「資源」貧乏。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歷史，真正的科學精神——批判理性主義還很微弱。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而是整個世界的知識界還沒有成熟到足以區別「泛科學主義」或「科學唯意志論」與真正的「科學精神」或「批判理性主義」的區別。無論在俄國或是中國，都面臨着成熟的理性精神的「資源」不足。

總而言之，我認為，(借用該文引言中的比喻)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時「學外語的緊迫感」，以及可供選擇「外語」的局限性而不主要是「母語」自身的局限。

劉擎 米勒瓦基  
92.5.24

## 對「五四」理性精神，應有具體分析

該文不同意「救亡」壓倒、中斷「啟蒙」的觀點，將五四啟蒙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視為一個思想脈絡上順理成章的過程，這個理解顯然是有份量的。指出五四與以後時期的深刻聯繫，這才使理解成為真正思想史意義上的理解。文中基本是認為，反傳統的「動力」只不過是突破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逆反，與此相應，便是「缺乏真正的超越性的理性精神」。

我認為從戊戌動搖傳統開始，就有兩種衝擊傳統的立場。一者以康有為《大同書》為代表，從一個高度理性化的立場批判傳統價值，譚嗣同的

《仁學》與此相關。另一則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從另一種現實之文化系統即西方價值系統來批判傳統。至五四兩者合二而一。五四貌似從西方文化立場批判中國傳統，實際上卻是憑理性以理想化了之「西方價值」批判傳統。

總之，沒有空洞之「理性」，只有具體傾向不同的種種「理性」。用這種概念提法來描述五四，是否更有思想史味一些？「價值逆反」的提法正反映出想盡量以傳統自身的邏輯（自我否定）發展推出五四的正面主張。但是傳統並不是自然就擺在那裏，呈現出三綱五常的模樣。傳統究竟呈現何種形象，本身就取決於觀察傳統的人有何種立場與角度。「實現倫理中心的突破」將傳統的社會一政治動能極度貶低，這一切本身就意味着一個理性的立場，又正是這同一立場與五四的正面主張如民主、科學、平等，乃至民粹傾向等密切相關。

程農 北京  
92.3.24

## 陳獨秀欠不得

第11期郭國燦〈近代尚力思潮述論〉遺漏了啟蒙思想家陳獨秀。消極方面陳抨擊同胞「富於模仿力，缺少創造力；……現代許多人都只喜歡辦雜誌，不問別的事業底方面發展，這也是缺少創造力底緣故。」（〈新出版物〉，1919）另一方面，他批判中國人欠抵抗力：「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

抗力，求為走肉行屍，不可得也！……吾國衰亡之現象，……抵抗力之薄弱，為最深最大之病根。」（〈抵抗力〉，1915）他歸咎於老子、儒學及佛教專制流毒、強求統一諸因素：痛貶忠孝節義為尼采所謂奴隸道德。積極方面他倡日本福澤諭吉的獸性主義，即現代化的斯巴達精神（見〈今日教育方針〉，1915）。四年後在〈青年體育問題〉謂：「杜威博士說奉天（天津）底學生體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但是講體育應有三戒：兵式體操、拳術、比賽的劇烈運動。」陳獨秀唯恐當局將孔子不語的怪力亂神來「賊夫人之子」，憂慮激烈運動助長鬥爭、妒忌和虛榮。

王煜 香港  
92.6.14

## 為了抵制「遺忘」

我幾乎是同時讀到舒衡哲的〈流離的記憶女神——論中國人和猶太人的民族記憶〉（《二十一世紀》第3期），和韓少功的短篇小說〈鞋癖〉（《上海文學》1991年第10期）。我在這裏提韓少功，是因為我「珍惜」閱讀中這種遇合，忍不住要記下來。〈鞋癖〉寫文革的災難及其留給過來人的內心創傷，寫文革之後人對文革經驗的成癖的固執；同時，作者強烈感覺到了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遺忘」。為了抵制「遺忘」，韓少功選擇了寫作來重新揭開血淋淋的歷史，以文本抵制健忘的現實，——套用舒衡哲論文裏的話，他為一己「找到了抗拒自發或迫致失憶症的法門」，自主地承擔記憶女神那「陰暗的重量」。我在私心裏把

舒衡哲與韓少功的兩種寫作通過一個普通中國人的閱讀而產生的遇合看成是一種稍帶神秘色彩的「象徵」。

張新穎 上海  
92.4

##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11期刊出邢慕寰教授〈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壓倒集體主義經濟理念以後〉一文時，在正文及目錄中均遺漏了該文副標題：「——為紀念一代宗師海耶克逝世而作」。謹向作者及讀者深致歉意。

第11期的圖片來源及版權說明有下列錯誤，謹此更正，並向版權持有者致深切歉意：

Corrections for mistaken photo credits given in issue No. 11, with apology:

(1) 頁13圖應為：香港藝術館藏品，香港市政局准予複製。(2) 頁19圖應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准予複製。(3) 頁75圖應為：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ichael C. Rockefeller Memorial Collection, Bequest of Nelson A. Rockefeller, 1979 (1979.206.7).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4) 封底圖應為：Reproduced by courtesy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二十一世紀》編輯室